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4月1日 (第234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麦艾文：美国如何制定一项持久的对华战略**

华盛顿必须调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与冲突，制定一项持久的对华战略。

# 中美关系

## 美媒称美应建立数字经济新秩序对抗中国技术雄心

美媒“法律事务”（Lawfare）网站3月17日载文称，拜登政府需要重振美国的领导力，以应对中国的技术雄心及其对国际数字经济的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新兴技术为当前国际经济法规体系带来了新问题。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无论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还是后来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都并未认真考虑监控、审查和商业间谍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建立“数字经济安全繁荣区”（SPADE），以协调各成员国在贸易、投资和信息通信技术采购领域的国内立法。美国可以在近期采取几项中间步骤，提升SPADE实现的可能性。

一是必须维持对中国的单边压力。拜登政府应根据《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授予的权力来抑制中国的技术雄心。二是继续利用出口管制法和其他单边措施来应对中国技术雄心带来的威胁。美国对此类法律的援引也可以为SPADE创始成员国的类似立法提供参照。三是与盟友一道，共同确定彼此对中国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能力的共同关切。四是借助现行制度提供的平台，解决与中国相关的问题。例如，拜登政府应探索重回《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

## 美智库：美应用四管齐下的战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等

执笔的报告称，美国不应以对称的方式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应把重点放在其可以单独或与盟友协作提供强有力的替代选项的领域。报告建议美国利用四管齐下的战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

首先，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风险。美国应在全球推动执行高标准的贷款行为；加强美国的商务外交，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替代方案，并提高东道国公众对某些“一带一路”项目环境和经济成本的认识；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它们审查潜在项目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

其次，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向联邦研发资金再投入 1000 亿美元，支持私营部门对下一代技术的投资；全方位提高对基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投入；修订移民和签证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加强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合作；改革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进出口银行，使其更灵活地与“一带一路”项目竞争；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美国的数字化转型替代方案。

再次，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应对。美国应与盟友和伙伴一道重振世界银行，使之成为优于“一带一路”的选项；与重要的地区伙伴协商行业贸易协定，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坚持要中国履行绿色“一带一路”的承诺，拒绝为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提供资金或保险。

最后，保护美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安全利益。美国应制定计划降低风险，以减少中国干扰“一带一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加大对海底电缆和海底电缆安全的投入；培养网络外交官，与东道国政府共同降低网络漏洞。

## 易明谈美国如何有效推进对华战略

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明 (Elizabeth C. Economy) 3 月 17 日出席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战略”听证会,就如何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有效地推进美国的政策提出了八项建议:

第一,必须考虑不断变化的世界结构。中国的经济规模或将在 2030 年超过美国,其人口规模已超出美国四倍多,在亚太地区也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这将需要美国更多依赖盟友与伙伴。

第二,将美国国内的价值观与在国外的领导力结合起来。这些价值观包括致力于包容和平等、自由贸易和经济机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在此框架下开展活动有助于美国释放积极主动的领导力的信号,并在国内外产生共鸣。

第三,明确指出中国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基于价值观与规范挑战,而非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抗衡。如果在中美双边背景下定义竞争,会使中国获得重要优势。一个包含价值观和规范的框架需要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参与进来。

第四,美国决策界承认美国需要在国内进行重组。美国需要重建并重新思考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持续增长,并确保对华竞争力。

第五,广泛深入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组织。美国应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与盟友围绕北极与太空治理制定协调的战略,以确保美国从相对有利的地位开展行动。

第六,与盟友及伙伴建立非正式工作组,协调推进共同的规范与价值观,并对抗中国的“胁迫”。确保民主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并鼓励欧洲更多参与亚洲安全。

第七,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应当植

根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经济机遇中，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并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应采用一项更加包容的外交框架，在思考如何推动一项共同的网络安全、治理和气候战略时将更多国家纳入进来。

第八，与中国开展合作，以此提升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以及全球性灾难的能力。应当重建双边对话，支持就共同关心的单一、有针对性的问题(如签证或海上安全)开展讨论和协商。

### 美学者展望美中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可能性

美国卡托研究所网站 3 月 22 日登载该智库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蒙·莱斯特 (Simon Lester) 的文章《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入第二阶段还是取消协议？》称，降低现有关税、与盟友合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华贸易工作的重点。

文章称，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提名听证会上，一些参议员提出了美中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前景问题，一些商业团体也呼吁签订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过往的经验表明这并非易事。第一阶段协议解决了相对容易的议题，如果要使第二阶段协议有意义，就必须解决更加敏感的议题。譬如，美国商会 (USCC) 和其他商业团体认为，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应解决补贴、网络安全、数字贸易和数字治理、竞争政策等议题。

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与其他国家合作产生的影响力要大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二是中国不想让自己看起来被一个许多人称之为“大国竞争对手”的国家摆布。因此，下一阶段的对华贸易谈判可能由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共同开展。美国及其盟友会以一种更低调的方式与中国谈判，这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更多权衡机会，从而使该协议更易被中国接受。但这并不容易，因为美国与其伙伴之间也存

在很多贸易摩擦。

除此之外，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税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对美国公司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拜登政府有意与中国展开新的谈判，降低现有关税是当务之急。虽然拜登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处境艰难，但它必须有所作为，与欧盟和其他国家协商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取代无休止的关税战。

### 麦艾文：美国如何制定一项持久的对华战略

**华盛顿必须调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与冲突，制定一项持久的对华战略。**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3 月 17 日登载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主席、亚洲集团高级顾问麦艾文(Evan S. Medeiros)的文章称，华盛顿必须调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与冲突，制定一项持久的对华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现在，美国必须与中国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由一个令人不安且不可否认的矛盾定义：一方面是深刻复杂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是在安全、经济、技术、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利益分歧加剧。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聚焦于降低风险，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却发生了逆转，不仅容忍还积极推动风险和摩擦。现在，拜登政府需要转向一个基于风险管理的框架，这意味着期待并容忍摩擦和紧张局势，甚至明智地使用它；接受美国行动的某些风险和成本；平衡多重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而不是试图调和它们；承认一些分歧无法解决；在必要时使用对话和合作，却不将对话和合作作为目的。这种转变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政策，既能反映出

两国关系竞争的核心，又能建立起持久的联系，经得起两国不可调和的利益的考验。

美中关系过去四十年的历史表明，成功的政策需要融合明确的优先事项、合理的程序和持续的沟通。有效与中国竞争不仅需要强硬，还需要巧妙：利用美国的优势，突出中国的弱点，迫使北京做出代价高昂的权衡，并在合作对美国有利时与中国合作。

在重建对华政策时，美国需要诚实地评估其选择和局限。美国对华政策一个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虽然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担忧，但美国的政策选择会产生副作用：帮助中国构建用以挑战美国的实力。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如何创造和维持国内对必要投资的支持，这些投资将使美国经济更高效、更具创新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新的方法必须包含一套动态的力量平衡举措，将中国与新的或现有的机构捆绑在一起，并促进外交对话和接触。美国也必须认识到，风险和摩擦不可避免。

现代的力量平衡不能仅依靠军事力量威慑中国，必须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它应该涉及单边和多边使用一系列美国政策，包括经济、外交、技术和军事政策，以防止中国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将中国拉进现有和新机制的捆绑策略会激励中国政府尊重普遍遵循的规则和规范，削弱其修订这些规则和规范的能力。由于涉及北极、网络安全、无人机、自主武器等的规则和规范不断演变，捆绑战略值得美国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最后，要认识到有关接触战略已死的宣告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当前的情绪，而非好的政策制定。接触和对话——以一种有针对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通常有时间限制的方式进行——将成为任何合理的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应考虑哪些方面的接触值得追求，并考虑战略对话的相对价值、承诺的有效性以及合作的风险与回报。

## 美国外交

### 美专家：美国在中东地区应关注影响力而非权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中东项目负责人约翰·奥尔特曼 (Jon B. Alterman) 近日撰文称，过去 20 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验表明，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表现良莠不齐，部分原因是过于狭隘地关注“权力”本身。

文章称，在谈论美国在中东的权力和影响力时，人们似乎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这是错误的。由于美国政府把它们视为同义词，20 年来为了建立影响力而投射力量的努力已经削弱了两者。

相较之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处理中东事务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直接寻求影响结果。在追求影响力的过程中，它们寻求的目标更为狭隘，关注自身能带来什么、能阻止什么，并对成功有更宽泛的理解。两国采取的步骤是根据自身的战略来制定的。

文章提到，从绝对值上看，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使其他任何国家都相形见绌。只有当美国坚持追求“权力”，而对手仅试图产生影响时，美国才会给人留下输家的印象。因此，美国在与中东地区接触时应更加谨慎，把重点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关注美国能做什么来促进自身利益并阻止对手，而不是关注美国希望做但做不到的事情。这将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并塑造更符合美国利益的中东局势。

### 美学者谈全球时代的大国协调机制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3 月 25 日登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



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Richard N. Haass) 等的文章称, 多权力中心的新兴世界可能预示着竞争和冲突越来越剧烈。

文章称, 竞争和冲突之所以会更加剧烈, 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已经过时, 已无力承担维护全球稳定的任务。人们需要全球大国协调机制, 来管理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事务。该机制的成员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协调机制的成员国将向常设总部派驻高级常驻代表, 具体地点由各方协商得出。协调机制将视需要定期举行以解决危机为目的的首脑会晤。尽管不会成为正式成员, 但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美洲国家组织这四大区域性机构也将派常驻代表进入协调机制总部。

该协调机制应当是协商而非决策机构, 负责处理新出现的危机, 制定新的道路规则, 同时集聚对集体倡议的支持力量。协调机制会把运行监督权留给联合国和其他现有机构。因此, 上述协调机制将补充而非替代现有的国际架构, 即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准备好决策, 而后在其他领域采纳和执行。

但设立全球协调机制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全世界重量级国家召集在一起也很难确保他们之间能够达成共识, 但管控而非消除对地区和全球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往往就意味着成功。拟议中的领导小组将认可自由和非自由政府都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这意味着西方必须放弃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好恶来打造全球形象的态度。此外, 严格将成员资格限制在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主体旨在牺牲代表权以换取效率, 这可能会强化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

## CATO 报告称代际效应正影响美国人的外交政策偏好

美国卡托研究所 (CATO) 网站 3 月 25 日发布报告称, 代际效应正在缓慢影响美国人的外交政策偏好。

报告称, 美国每年约有 200 万年长、更保守、更强硬的人去世, 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更自由、更温和的人。公众对国际参与的支持总是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而起伏, 但从长期来看, 已经出现了一种清晰的跨越党派界线的模式。如今, 年轻美国人更支持合作性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激进的国际主义, 更不像年长美国人那样支持使用武力。“千禧一代”和“Z 世代”对当今高度军事化的外交政策的支持度最低。

报告称, 这些发现对美国外交政策至少有两个重要启示。首先, 公众支持国际参与的性质正发生真正的变化, 且这种变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尽管像其他美国人一样, 年轻美国人也遭受着政治两极化的困扰, 但这种新的国际主义模式影响着两党的“千禧一代”和“Z 世代”。随着年轻人在选民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他们的偏好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也会上升。

其次, 形成新的外交政策共识可能有难度。尽管华盛顿越发意识到应改变美国的大战略, 但美国年轻人的观点与华盛顿精英的传统偏好越发脱节。几十年来, 民意调查显示, 两党政治精英比公众更支持国际参与(包括军事干预), 大多数公众更愿意聚焦国内事务而非外交事务。

不过, 报告最后称, 有证据表明, 虽然年轻美国人对军事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信心, 但他们仍非常支持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年轻人不希望美国脱离世界, 同时, 他们想改变美国参与世界的方式。

## 拜登政府想牵制中国，但亚洲却没有“北约”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3 月 26 日载文称，美国需要制定策略来牵制中国，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巨大的伙伴。

文章称，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把中国列为头号地缘政治对手，但不同于前任，拜登及其团队希望借盟友和合作伙伴之力而非单方面应对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在冷战早期，华盛顿曾带领一批欧洲国家对抗苏联威胁。如今，在与中国的对抗中，美国没有同样的选择。从本质上讲，问题在于如何借一群差异甚大的伙伴来牵制中国。

美国官员表示，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组建一个类似于“北约”的组织来对抗中国。拜登政府希望借更小的集团来做类似的事情。拜登政府希望加强现有组织或机制，如东盟和“四方安全对话”。但问题在于，东盟主要关注经济问题，避开了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而“四方安全对话”关注的是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此外，在情报共享方面，美国与北约盟友以及“五眼联盟”的主要伙伴定期共享情报，但在全亚洲并没有类似的网络，尽管澳大利亚是“五眼”成员。现在，华盛顿必须考虑韩国、菲律宾和印度等国不同的制度。

拜登政府还必须在该地区制定不同的人权标准。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印度高层官员表达了对印度穆斯林人口处境的担忧。泰国和菲律宾两国都受到国内人权问题的困扰，而且它们并不在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首次海外出访地之列。

## CSIS 报告为强化美韩同盟建言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朝鲜半岛委员会召集跨党

派专家成立工作组，研究如何重振美韩同盟。近日，该委员会发布报告，针对如何强化美韩同盟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向国内民众重申强大联盟带来的共同利益。对韩国来说，与美国这个没有领土野心的远方大国结盟，对于其能否在与邻国关系不佳的环境中繁荣发展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在应对地区最紧迫的安全挑战，以及维护印太地区开放、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方面，韩国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二，清除两国关系中的“战术灌木丛”，将重点放在更广泛的挑战上。双方应尽快完成在特朗普时期陷入僵局的《特别措施协议》(SMA)谈判；仔细协调有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OPCON)转移，使之不受制于执政党的更替；两国还应考虑开展“灰色地带”防务规划对话。

第三，恢复和加强美国的延伸威慑。重申驻韩美军及其家属与韩国人是“命运共同体”，美国的存在是其绝不与盟友脱钩最有意义的标志；通过高层军事交流和信任培养活动，增加美国延伸威慑的可见度；升级双方在防御能力及联合进攻能力方面的协调；创建新的年度双边延伸威慑会议，恢复之前的磋商渠道。

第四，为实现“弹性亚洲”建立联盟。美韩必须改变“反华”联盟的老调子，以积极、有远见、基于原则的框架来合力塑造一个“弹性亚洲”，如果中国遵守规则，欢迎其加入；美韩及其他盟友和伙伴应发起多边努力，援助那些被中国视为经济目标的国家；美、韩、日三方开展密切的防务和情报合作可在应对安全挑战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五，扩大联盟的范围。重振太空、网络、公共卫生、能源、环境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等领域的“新前沿”议程；将共同价值观作为联盟的核心基础，在“民主十国”等群体中支持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协调双边和多边发展政策。

第六，有原则地切实推进朝鲜无核化。美韩同盟的目标仍应是完全、可核实、不可逆的无核化；重点必须放在阻止朝鲜核计划进一步发展和管理威胁上；与朝鲜的谈判不应以牺牲美国盟友的利益为代价，而应该与它们密切协调；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核不扩散制裁措施只有在朝鲜采取无核化措施的情况下放宽；美国应该支持半岛南北接触，特别是在人道主义领域；让中国支持无核化，同时不将该政策“外包”给中国。

第七，扩大区域、多边贸易以及全球治理倡议。美韩应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制定倡议，在补贴、国有企业、数字规则和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上建立规则；在经济领域制定具体计划，以支持更广泛的环境和气候联盟倡议；合作发展更安全、更多样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两国应对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持开放态度。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智库称美应重建其制造业的竞争力

美国进步中心（CAP）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扎素里克（Marc Jarsulic）执笔的报告称，美国的制造业面临着重大挑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建立与全球制造商的竞争力，尤其是美国中小企业。依赖科技进步的生产力增长是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但在大多数美国制造业部门，美国的生产力增长显著低于德国代表的最高标准。此外，很多美国中小企业

的生产力无法与中国及其他竞争者的成本优势竞争。美国是世界科研的领导者，而美国的制造业却无法将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转化为在制造创新和生产力增长方面的优势。报告建议美政府：调整并拓展现行的“制造业延伸合作关系”（MEP）项目，以协助中小企业将尖端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和制造工艺，并为制造业工人提高工资及就业；调整并拓展现行的“美国制造”计划（MUSA），以保证适用于制造业的早期科研留在美国；要求联邦政府从高产能、高待遇和具有良好就业培训的美国公司购买产品，以支持就业并鼓励创新。

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克服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风险，特别是在医疗、国防和其他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在疫苗生产和防护装备等领域供应链的弱点。国防部评估指出，在一些领域需要培养对安全、可信和技术先进的制造业的需求。报告建议美政府：认真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制造业产品规划供应链；支持具有战略必要性的国内制造产能扩张；在存在重要战略风险的领域，与可信任的伙伴国建立供应协议。

### 美学者谈美国保守主义及其未来

美国传统基金会近日召开线上研讨会，邀请美国学者乔治·纳什（George H. Nash），共同探讨美国保守主义及其未来。

纳什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首先，拜登当选后众多美国保守派人士处于极度焦虑状态，因为全美政界、媒体界、娱乐界、科技界、教育界都被民主党垄断，目前保守派在现实中的确处于守势。美国保守主义推崇的主张，如对个人自由的承诺、有限政府和宪法与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政治哲学，显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其次，1945 年以后美国保守主义从未真正形成一个整体，而是分成了五个不同的流派，即传统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国家安全保守派、新保守主义者和宗教右派。尽管冷战时短暂出现的融合主义成功让保守主义者们认识到，保守主义不能成为宗派或者教条，但 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保守主义受到民粹主义的猛烈攻击。自此，保守主义内部各派开始互相争执。在过去三年中，融合主义哲学受到批评，里根主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有限政府、自由贸易等理念被拒绝和否定。

纳什认为，保守主义者需要采取更多防御性措施，扩大自身影响力。一是倡导保守主义的话语权和制度化，同时与其他持不同政见的自由派和其他人士建立联系并开展合作。二是反对将美国历史符号化或者简单化，因为这样将不利于年轻一代接受美国历史对他们价值观的塑造。三是利用当下美国左翼盛行的“取消文化”（当一个名人所言所行不符合美国政治正确或者犯错时将被民众抵制）形成的高压，拉拢“取消文化”的受害者，使他们从左翼倒向右翼。四是在处理少数族裔与移民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应当避免将美国右翼与种族主义划等号，应该让群众认识到什么人真正对自己有帮助，而不是以派别、主义的身份进行判断，如民主党、共和党、左翼和右翼等。

### **拜登政府首个国防预算提案应考虑九个问题**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劳伦斯·科布（Lawrence J. Korb）近日撰文称，拜登政府在向国会提交 2022 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时，应考虑九个关键战略决策：

第一，是否愿意大幅削减 2022 财年国防总预算的规模，从拟议的 7550 亿美元降至约 7000 亿美元。削减国防预算意味着可

以腾出更多资金用于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或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

第二，是否增加对国家安全非军事部门的资助。拜登可以通过提出一项优先考虑外交团队的预算案，来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三，拜登政府是会建议保持现役军人的规模还是会试着更多依赖技术，目前仍不明朗。鉴于五角大楼将重心从陆军转向空军和海军，拜登可能选择调整军队的规模。

第四，决定是否要缩小核武器在美国军事理论中的作用。拜登政府必须考虑是否继续为发展和部署一整套核武器提供资金，还是减少对核武器的过度依赖和开支。

第五，拜登政府面临着其前两任政府使用海外应急行动（OCO）账户资金的遗留问题。如果拜登政府不计划全面实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计划，他是否会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190 亿美元的基础上增加海外应急行动账户的金额，还有待观察。

第六，必须就如何在太平洋地区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做出艰难抉择。这包括决定是否为新的美国海军造船计划提供资金。该计划提出，到 2030 年将美国海军舰艇的数量从现有的 296 艘提高到 358 艘，到 2045 年提高到 500 艘。

第七，如果拜登重新加入《开放天空条约》，他将需要花费必要的资金使美国能够执行这项任务，包括确定俄罗斯是否有效遵守军控条约。

第八，必须决定是否允许第五代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进入大规模生产，其成本将高达 1.5 万亿美元。该飞机仍然存在严重的设计和软件缺陷。

第九，需要决定如何处理五角大楼的浪费和管理不善问题。拜登政府需要决定是否要优先考虑完成国会授权的对五角大楼进行的全面审计。



## 拜登政府将如何影响美科技巨头

美媒福布斯网站近日载文称，拜登政府如何处理 H-1B 签证政策、“230 条款”和对科技公司增税等议题将对美科技巨头及整体技术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文章阐述了拜登政府影响科技巨头的五种方式，摘要如下：

第一，针对相关中国企业的交易禁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限制美国公司与中兴、华为等中国同行的贸易，并试图禁止中国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进入美国市场。伴随新一届政府而来的是新的政策导向，拜登总统很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寻求国际协助。例如，他可能会向欧洲盟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切断与中国企业的交易，否则威胁停止与它们分享情报。在寻求结束单边施压并获得国际支持的同时，拜登政府仍有可能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第二，放宽对高技能人才的签证发放。在 2017 年特朗普就职前，移民人口占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工作岗位的 43%。2020 年，特朗普限制向高技能外国工人发放 H-1B 签证。但拜登就任后推翻了这一决定，重新允许高技能工人在美国申请工作签证。这一改变将使留学生们有望在毕业后继续留在美国工作，从而使美国高校能够吸引更多顶尖海外人才。

第三，修改反垄断政策。一些反垄断组织建议，拜登政府应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强硬立场，包括扩大反垄断案件，拆分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此外，反垄断组织还希望废除非竞争条款，通过阻止不同企业同一平台上开展业务和竞争来结束利益冲突。

第四，“230 条款”何去何从。该条款受到了国会两党的批评，但两党责难的理由截然不同。共和党人认为，该条款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对互联网的保守派言论进行审查；而民主党人则认为

该条款袒护互联网上的暴力或仇恨言论。随着政府更迭，新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内森·西明顿（Nathan Simington）预计将把工作重点放在 5G 建设、网络中立和弥合数字鸿沟等议题上。

第五，向科技巨头增税。拜登在上任前曾承诺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拜登誓言将公司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并对公司的账面收入或向股东报告的利润设定 15% 的最低税率。他还承诺对美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征税，这将对科技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拜登即将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来自国外：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在应对法国政府的“数字服务税”，并可能面临其他国家的类似税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近表示，将推迟关于法国对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征税的裁决，这实质上是将决策的责任移交给了拜登政府。美国将可能需要领导一项全球谈判，以解决数字服务税和如何达成公平协议等问题。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